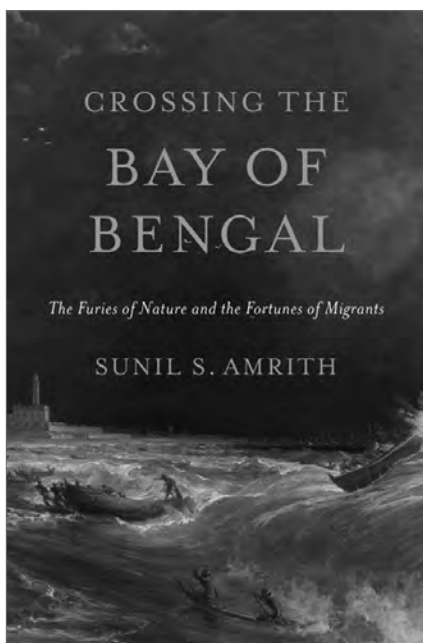


移民與生態交織下的 印度洋區域史

——評 Sunil S. Amrith, *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

● 朱 明



Sunil S. Amrith, *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隨着全球化的發展，人員、資本、物種等越過國界在國家之間自由流動，但是國家之間的壁壘卻隨着競爭的加劇而日益森嚴。一方面，人類社會面臨着共同的經濟、政治、環境問題；另一方面，高舉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卻往往以鄰為壑，無視共同面對的問題，甚至極力擺脫自己應負的責任。這為我們思考當前的國際問題帶來了困境——既要順應全球化的趨勢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去考察人與物的自由流動，但是又不得不正視民族國家力量的增強及其對流動的限制。這種矛盾幾乎出現在世界的各個區域，位處印度洋北部的孟加拉灣一帶表現得尤為明顯。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對於現實的憂慮，阿姆利特 (Sunil S. Amrith) 的《穿越孟加拉灣——自然之怒與移民之幸》(*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隨着全球化的發展，人員、資本、物種等越過國界在國家之間自由流動，但是國家之間的壁壘卻隨着競爭的加劇而日益森嚴。《穿越孟加拉灣》一書從歷史的維度追蹤了孟加拉灣的人員流動和生態變遷，並且探討了其當代命運的緣由。

作者介紹了孟加拉灣的自然環境，並追溯了早期歷史的發展及其作為這個區域整體性的基礎，顯然是受布羅代爾的「地中海模式」和整體史觀的影響，將孟加拉灣視作一個類似地中海的自成一體的區域。

Migrants，以下簡稱《穿越孟加拉灣》，引用只註頁碼)一書，從歷史的維度追蹤了孟加拉灣的人員流動和生態變遷，並且探討了其當代命運的緣由。

作者阿姆利特成長於新加坡，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是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的研究領域為人員、思想、制度的跨區域流動，尤其側重對孟加拉灣的研究，兼及移民史、環境史、公眾健康史。本書獲得了2014年美國歷史學會關於南亞歷史的約翰·理查德獎(The John F. Richards Prize)。同時，該書也是作者對孟加拉灣周邊環境變遷史研究的大型項目的初步成果^①。阿姆利特的求學經歷促成了其獨特研究視角的形成。劍橋大學多年來對新帝國史、全球史的研究，以及印度學界多年來流行的庶民(subaltern)視角，都使他非常重視底層民眾，選擇從邊緣和底層的角度重述歷史。這些正是該書脫穎而出的基礎。

從研究範疇來看，這部作品屬於區域史或區域研究。然而，它與傳統意義上的區域史和區域研究又有很大的不同。從區域史的角度來看，對於印度洋的研究最早是受到法國年鑒學派(the Annales School)代表人物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模式」的激發而開始的^②。但是在最近若干年，由於地中海研究者的注意力開始轉向生態史、環境史，因此也帶動了印度洋研究的轉向^③。從區域研究的角度來看，以往的南亞研究和東南亞研究在研究陣營上是分開的，二者之間很少有交集。但是在全球化日益迅速展開的當下，這種隔絕開

始有所突破，尤其是最近十餘年流行的全球史愈來愈關注跨國、跨區域的流動和聯繫^④，而南亞和東南亞之間的流動和聯繫卻一直以來很少被注意，或者說，它們一直都被掩蓋在熾烈的民族主義的陰影下。因此，《穿越孟加拉灣》一書適時地作出了突破，在區域與生態、地區與全球之間進行了綜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獨樹一幟，具有很大的創新性和較強的現實意義。

一 主要內容介紹

從內容上來看，該書總共有八個章節，基本上是按照時間順序，概述孟加拉灣的流動的源起、發展和現狀。

在第一章中，作者介紹了孟加拉灣的自然環境，並且追溯了早期歷史的發展及其作為這個區域整體性的基礎。顯然，這是受布羅代爾的「地中海模式」和整體史觀的影響，將孟加拉灣視作一個類似地中海的自成一體的區域。這個區域的國家受一些共同的自然因素影響，譬如季風，也有一些共同的歷史背景，譬如六至八世紀帕拉瓦(Pallava)王朝的寺廟建築和雕塑影響到整個東南亞，九至十三世紀朱羅(Chola)帝國借助其強大的商人集團縱橫東南亞，成為橫跨孟加拉灣的大帝國，並且與孟加拉灣對面的室利佛逝(Srivijaya)帝國以及爪哇的馬塔蘭(Mataram)王國長期競爭、角逐。在孟加拉灣對岸還有位於今日緬甸的勃固，它南通錫蘭，北接雲南，與兩地分別有文化和商貿的聯繫。另一方面，宋代中國

也發展起強大的海外貿易，勢力遠達孟加拉灣。孟加拉灣的商業活力在公元1000年前後開始的「中世紀溫暖期」達到了巔峰。十三世紀以後，溫暖期結束，亞洲經歷了內亞游牧民族的新一波征服。突厥人在北印度建立德里蘇丹國(Delhi Sultanates)，並不斷向南擴張，中國也出現了宋元易代。然而，伊斯蘭文化在印度的擴展並沒有阻礙南印度的泰米爾商人在孟加拉灣的流動性(頁17)。

此外，作者利用印度神話、東晉僧人法顯的記載，以及近現代的傳說等，展現了孟加拉灣作為早期印度世界的東部邊疆的險峻環境。從十六世紀起，歐洲人來到這裏展開權力和利益的角逐，並隨之帶來交通方式的變遷。早期的船隻航行受季風等自然條件的約束，但是隨着輪船的應用，人們可以逐漸擺脫這種束縛，而二十世紀以降航空和定期航班的發展與普及更是改善了地區之間的交通狀況。一般人認為前殖民時期的海洋是開放的，而此後便被殖民者控制，並被其劃定的邊界所阻礙。作者認為這是浪漫化的想法，忽視了以往航海的巨大危險。在作者看來，十九世紀以後的殖民時代是孟加拉灣人員流動的高潮時期。作為印度和中國之間的通道，這裏有印度教徒、穆斯林、中國人、馬來人往來穿梭，其流動之頻繁程度遠遠超過了前現代時期(頁29)。

在第二章中，作者探討了近代早期孟加拉灣作為印度洋商業中心的地位。他指出，在歐洲人將新的領土、法律、宗教觀念帶來之前，這裏就已存在一張繁忙的商業網

絡，尤其是南印度泰米爾地區的許多地方都與孟加拉灣對岸有着密切的商品和人員流動。與此同時，孟加拉灣的兩岸也先後經歷了伊斯蘭化，波斯人、海德拉毛人在這裏有着廣泛的流動和分布，泰米爾的穆斯林也在這裏到處經商。在歐洲人到來之前的十五世紀，這個區域的商業化導致城市從內陸轉向沿海，促成了一批沿海城市興起，譬如從吳哥、蒲甘、素可泰等內陸稻作集中地和王權中心轉向勃固、馬六甲、淡目，港口城市成為重要的新興力量。從十六世紀起，葡萄牙、荷蘭、英國先後在這裏經營，但是它們都不得不重視這裏原先存在的商業習慣和秩序。

除了沿海城市的興起，這裏區域性的政治結構也為歐洲人到來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十六至十七世紀，中世紀的帝國紛紛解體，政治分裂造成各種地方勢力自成一體，主要王朝和權力中心並未在空間上徹底完成後來意義上的國家統一，還只是處於對邊疆的開發和征服過程中。如莫臥爾(Mughal，又譯蒙兀兒)帝國直到十七世紀才進入南印度和徹底征服孟加拉，但仍然面臨着許多獨立性很強的地方勢力。這裏的離心勢力試圖與歐洲人合作，但也招致了權力中心對這些獨立政權和港口城邦的兼併潮流。也正是在與歐洲人的競爭中，孟加拉灣的早期現代國家成型了(頁49)。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形式上，相對於印度西南馬拉巴爾海岸盛產的大宗商品香料，孟加拉灣沿岸的科羅曼德爾海岸的主要商品是棉布，商人用來換取東南亞的香料。然而當歐洲人攜帶白銀來到孟加拉灣

一般人認為前殖民時期的海洋是開放的，而此後便被殖民者控制，並被其劃定的邊界所阻礙。在作者看來，十九世紀以後的殖民時代是孟加拉灣人員流動的高潮時期。

十八、十九世紀，歐洲人將孟加拉灣東部作為「邊疆」進行開發，對人力的需求帶動了南印度的勞工向孟加拉灣東部遷移。此外，城市中的神廟建築可以反映移民的流動情況，因為信仰是會隨之遷移的。

時，棉布便取代香料成為運往歐洲的大宗商品。此外，印度的大米也是向東南亞出口的大宗商品。

在第三章中，作者探討了歐洲人到來以後孟加拉灣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帶來的變化。十八、十九世紀，歐洲人將孟加拉灣東部作為「邊疆」進行開發，對人力的需求帶動了南印度的勞工向孟加拉灣東部遷移。這種流動主要在檳城、新加坡、錫蘭之間進行，有警察、罪犯、工人（包括來自中國的勞工）等。此外，作者認為城市中的神廟建築可以反映移民的流動情況，因為信仰是會隨之遷移的。當然，在宗教的儀式方面也出現了混雜性，伊斯蘭教、印度教、中國宗教之間都互有雜糅，佔用共同的空間。由此可以看出，遷移來的勞工之間雖然經常出現分歧，但是他們在某個共同區域居住，相互聯繫增強，這使其屬地性超過了族裔性，共同性超過了差異性。但是，殖民政府卻在移民中製造隔閡，將其分成不同的種族（如印度人、馬來人、華人等）以便管理，從而使原來不分彼此的雜糅群體變成了存在差異性的族裔群體。同這種對人群的劃分一道，歐洲人還對空間進行劃分，即構建邊界。例如1824年英國與荷蘭劃分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邊界時，就絲毫沒有顧及二者的歷史和文化。從此，位於邊界兩邊持相同語言的群體也開始將對方視作外國人，而原本語言和宗教都不同的群體則彼此成為擁有同一個祖國的同胞。

第四章論述了十九世紀起歐洲人為孟加拉灣帶來的徹底改變。在這一時期，歐洲人開始在稻作區以

外的邊疆森林地帶進行開發，帶動了非自由勞工的更大規模的遷移。作者認為這類似於同時期歐洲人往美國新大陸的遷移。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尤其是從1870年起，大量印度南部人開始遷往孟加拉灣東岸的馬來亞和緬甸工作。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拉近了孟加拉灣與歐洲的距離，而電報、鐵路、輪船的發展則促進了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和信息流通。在這種外因的便利條件下，種植業的發展更是促進了移民的流動，尤其是咖啡、茶、糖、橡膠等種植業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對勞工的需求。

譬如，馬來亞引進南美的三葉膠，成功地培育出新的橡膠品種，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勞工。1880年代起，勞工遷移成為孟加拉灣的一種產業，南印度的泰米爾地區尤其成為主要的勞工輸出地。這些勞工或者出於貧窮所迫，或者是被集體地引進，成為種植園中的契約勞工（其更多的還是非自由的遷徙）。在這種遷徙中，蛇頭（kangany）起到關鍵作用（頁116），他們與種植園主合作，將大量移民帶往孟加拉灣對岸。也有大量南印度和孟加拉地區的勞工前往緬甸，但是由於當地不是以種植園經濟為主，因此他們散落在各個行業。基本而言，南印度泰米爾人會前往錫蘭和馬來亞，稍北邊的泰盧固人和孟加拉人會前往緬甸，他們基本是在同一緯度的範圍內進行遷徙。

第五章介紹了移民的生活狀況及其身份的變化。仰光的移民中以印度人佔多數，檳城、新加坡則是華人佔多數，這裏成為印度和中國

的「城市邊疆」(頁148)。作者運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法，細緻描繪了移民在仰光的城市生活，如他們的職業分布、衛生狀況、家庭情況，等等，尤其對處於底層的妓女的辛酸生活和移民家庭的悲慘遭遇花了較多筆墨。作者對以往的宏觀研究有一定的批判，並尖銳地指出，我們將移民化為抽象的數據，只談論網絡和流動，卻忽視了那麼多個體的、鮮活的生命(頁156)。

1930年代，馬來亞的橡膠業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對東南亞本土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諸如交通方式、消費模式、人口構成、族裔分布、階級情況等。因此，本土原有的以種植園為主的經濟面貌也在發生變化。隨着汽車、自行車等交通工具被廣泛使用，相應地，移民的居住方式、相互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在這之上，是移民認同和身份的變化。如馬來亞的泰米爾人開始日益增強對印度民族國家的情感，但是他們發現其他族群的民族主義意識也逐漸增強。馬來人開始排斥外來移民，激發了這些泰米爾移民尋求公民權。因此，這一種認同與他們對印度的國家認同發生了衝突，從而產生了認同的斷裂，也迫使他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歸屬問題(頁174)。他們面臨一個新的任務，那就是必須選擇一種身份，並且成為其國家的公民。

在第六章中，作者講述了孟加拉灣自由流動的結束和國家邊界的劃定。在1930年代世界經濟經歷了危機和蕭條之後，孟加拉灣的東部地區開始對移民持排斥態度，這與同時期的歐洲有相似之處，希特勒也正是在這時候反對外來移民。

而這與正在蓬勃興起的民族主義又聯繫在一起。新興國家緬甸和馬來亞想要通過團結移民反對印度(英殖民政府)的干預，譬如緬甸對印度移民不分族裔和信仰地進行團結，就是為了抵制印度的影響。這時期民族主義的發展，強化了對領土的歸屬意識，而不再是鼓勵海洋上展開的自由流動。新興民族國家極力控制人口的流動，並將人們轉換成為俯首帖耳的國民，這恰恰與以前的自由流動理念相反。有意思的是，在疆界關閉的同時，卻出現了其他方面的開放性，如勞工不分國別地團結起來，共同鬥爭。然而，民族國家的號召力也在加強，譬如緬甸出現的印度國民軍，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佔領緬甸時期同曾經的殖民者英國決裂並鬥爭，他們認同印度，將自己的認同建立在母國身上。

在生態環境方面，這時期緬甸和東南亞作為生態的邊疆開始被大規模地開發，日本統治時期政府也利用大量勞工血汗修成泰緬鐵路。這裏成為向英屬印度供應糧食的重要地帶，稻米成為連結孟加拉灣周邊各地的重要產品，尤其是緬甸和泰國成為重要的稻米出口國。然而，當二戰期間印度出現歉收饑荒時，這裏卻沒有及時地進行糧食支援，尤其是日本控制的緬甸沒有向印度輸出糧食，這使孟加拉地區受害深重。這也與這個區域數個世紀以來人口增加、生態環境惡化、民族國家的劃地為界和以鄰為壑有關。邊疆地帶是印度腹地的糧食供應地，一旦這裏失守，就無法保證腹地的安全了。孟加拉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民族主義的發展，強化了對領土的歸屬意識，而不再是鼓勵海洋上展開的自由流動。有意思的是，在疆界關閉的同時，卻出現了其他方面的開放性，如勞工不分國別地團結起來，共同鬥爭。

帝國主義撤離後的孟加拉灣被民族國家所包圍，國家建構成為這個區域的主潮流。雖然當時也出現了突破民族國家、實現區域聯盟的潮流，但在冷戰的總體環境下這些努力都流產了。

在第七章中，作者探討了二戰之後的孟加拉灣開始出現對公民權的追求。當時，新興國家緬甸和馬來亞開始限制外來移民，它們確定邊界，發放護照，頒布公民法案，並且防止外來移民破壞本國人口結構；而印度也限制本國公民的任意離開。這樣，就從邊界和身份上定義了本國公民。這是經歷了帝國主義撤離後的新興民族國家對政治顛覆、非法移民、外來影響的擔憂所導致的。隨着邊界的確定和公民身份的定性，也衍生了少數族裔的問題。這些被視作「帝國的孤兒」（頁225）的人群曾經在前現代的大流動時代往來於孟加拉灣兩岸，但是在民族國家化的時代卻成為被拋棄的社群。如吉大港的阿拉干佛教徒社群、緬甸若開邦的孟加拉穆斯林社群、錫蘭的泰米爾人、東南亞的華人，都是民族國家內部的少數族裔，至今他們仍然在為爭取公民權而同民族國家鬥爭。至於那些仍然留在孟加拉灣東岸的印度人則逐漸地融入到了所在國，這些離散社群成為所在國的組成部分。然而，泰米爾人、華人的公民地位仍然是新興國家需要解決的內部問題，從而帶動了戰後的社會運動，少數族裔為提高其社會地位而努力。他們與原先的母國也只存在一種文化上的聯繫，作者認為，這類似於大西洋兩岸的遷移和美洲歐洲人社群建設的歷史。

自二十世紀中葉起，孟加拉灣也出現了生態上的變化。馬來亞的油棕種植取代了之前的橡膠種植，因為天然橡膠的市場開始萎縮，大量歐洲人的橡膠種植用地轉手給華人。這導致了以前依靠香蕉

種植業為生的許多泰米爾勞工失業和陷入困境，也使他們無法獲取公民權。帝國主義撤離後的孟加拉灣被民族國家所包圍，因此國家建構成為這個區域的主潮流。雖然當時也出現了突破民族國家、實現區域聯盟的潮流，但是在冷戰的總體環境下，這些努力都流產了。而且，美國非常強調孟加拉灣的戰略地位，因此間接推動了學界對孟加拉灣的區域研究，即要掙脫大印度和大中國的影響，從已經存在的民族國家出發，用其過去的歷史遺產為其現在的合法性論證。筆者認為，這也是東南亞新興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在歷史研究上的投射和反映。

另外，這時期隨着世界範圍內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糧食的自給自足，孟加拉灣東岸已經擺脫了主要糧食出口地的身份，開始轉向以本國的民族國家為框架的生態發展。譬如，二十世紀後半葉馬來西亞開始的新一波森林開發，就是為了開採木材和棕櫚油，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要。當地同時也開始了對海洋的開發，只是這時出現的不再是跨孟加拉灣的貿易，而是轉向了經營國家附近海域的資源。新的港口也開始建立，逐漸取代了殖民時期的港口城市，那些曾經為跨孟加拉灣流動而建造的港口逐漸衰落，作者稱其為孟加拉灣的「死亡」（頁248）。由此可見，民族國家化對於這個曾經自成一體的區域影響甚大。

第八章對當代的孟加拉灣做了現實層面的探討。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後，印度通往中國的區域成為重要的戰略地帶，再次得到各國的重視。中國的工業革命急需

能源，而其運輸過度依賴馬六甲海峽產生了所謂「馬六甲困境」——中國能源不安全的代名詞。因此，擺脫對馬六甲海峽的依賴，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開通從中國到印度洋的海路。為此，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成為發展這種策略的口號和歷史依據。中國在印度洋上投資了很多港口，尤其是在緬甸的孟加拉灣沿岸，通過實兌港、皎漂港、吉大港將其與中國西南的雲南、貴州直接連起來。從地緣政治上來看，這正是要加入到孟加拉灣的經濟世界中來。同樣，印度也在加強對孟加拉灣的控制，在這裏增強軍事部署和經濟往來。

然而，同各個國家的戰略圖景不同的是，這個區域的生態環境出現愈來愈大的變化，呈現出愈來愈不穩定的面貌。人類對這個海域的影響日益增強，對海洋的利用和改造也在加快步伐，這些都導致了沿海的景觀變化，帶來的是整個區域的生態變遷，捕魚業、城市化、農藥的使用、石油開採，等等，都在破壞海洋環境；每年都有大量垃圾

從陸地排入孟加拉灣的海水中。隨着森林砍伐，大量樹木消失，尤其是能夠抵禦海水侵蝕泥土的紅樹林，讓位於養蝦場等工業場所。由於河流大壩的建造，也給入海口的區域造成了破壞，使到達這裏的積澱物逐年減少，從而造成愈來愈嚴重的生態危機。而且，由於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也正在給孟加拉灣周邊地區造成損害；特別是與該區域的季風結合起來，更是帶來了大災難。這也將產生「氣候移民」，為民族國家的安全帶來難題。雖然這種遷移在歷史上也存在過，但是二十世紀中葉劃定的民族國家邊界將嚴重阻礙這種遷移。尤其隨着全球化的發展，民族國家之間的壁壘將變得前所未有地森嚴（頁267），那些曾經正常流動的移民此時被貼上了「非法移民」的標籤。

與此同時，歷史上存在過的跨國勞工流動又復活了，當前，泰米爾勞工再次大量進入馬來西亞、新加坡務工，但是他們的工資低廉、社會地位低下，都是沒有權力和權利的底層勞工，這構成了跨國界的

當前，泰米爾勞工再次大量進入馬來西亞、新加坡務工，但是他們的工資低廉、社會地位低下，都是沒有權力和權利的底層勞工，這構成了跨國界的社會問題，與一個世紀以前的勞工狀況有很大的相似性。



孟加拉灣海面發生撞船事故，漏出大量油污，造成海洋生態災難。（資料圖片）

社會問題。但是對於這些有血有肉的個人而言，成為遷移的勞工又是他們自我實現的途徑。由於不少家庭所擁有的少量土地和賺取的微薄收入受到環境惡化的影響，促使他們借貸遠赴海外賺錢，如果失敗的話，會進一步加劇其家庭的艱難處境。這與一個世紀以前的勞工狀況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是當今孟加拉灣地區面臨的重要問題。

二 學術和現實意義

通過八個章節的論述，《穿越孟加拉灣》一書依次探討了孟加拉灣從近代早期經由殖民時代再到當下的發展歷程。作者的跨區域視野和對底層的關懷使這本書有着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其特色有如下幾點：

首先，整本書緊扣邊疆，從邊疆出發，跳出了民族國家的框架，突破了這個框架中的線性歷史敘述模式，在更廣闊、流動性更強的空間中考察孟加拉灣這個區域，尤其注重這個空間中的各種聯繫。

「邊疆」概念最早來自美國的邊疆理論，用於研究美國向西部的拓展^⑤。作者強調了生態意義上的邊疆，也就是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文明意義上的邊疆。孟加拉灣東部區域是歷史上長期以來東亞和南亞移民的目的地，也是西方殖民者到來以後進行森林砍伐和引進植物後形成的特殊區域。這裏有別於印度和中國的核心地帶，但也與這二者的邊緣地帶交接，並且產生頻繁的聯繫^⑥。在作者看來，孟加拉灣東部於十九世紀下半葉構成了「生態的、

文化的、法律的邊疆」(頁130)，有大量農民在這個區域流動，成為契約勞工。如泰米爾勞工在馬來亞的橡膠種植園工作，為美國的汽車產業提供原料，這裏成為英帝國眼中最有經濟價值的地方；緬甸成為世界最大的稻米輸出國，接收了大量的印度移民作為勞工。據作者統計，在1840到1940年間，有2,800萬人穿過孟加拉灣，使這裏成為最大規模而又最鮮為人知的移民區域(頁104)。

在十九世紀以來民族國家編織的話語和宏大敘事當中，我們只知道孟加拉灣兩岸的帝國和國家的歷史^⑦，也了解它們相互之間的征伐及其興衰，但是對它們之間的交流卻所知甚少。到二十世紀，民族國家日益強調自己的邊界和身份，並且在特定的邊界以內建構其悠久的歷史，從而證明或增強其合法性。但是，對於跨界流動的區域更難以闡明其歸屬，譬如印度南部大量的泰米爾勞工穿過孟加拉灣到達馬來亞，他們與印度的民族國家認同又產生了矛盾，形成個人、群體與國家之間的張力。作者將這個區域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凸顯這裏起聯繫作用的船隻、航道、電纜、家族和郵件等構成的網絡，還有網絡中的貨幣、神廟等等，這些都是構成孟加拉灣整體性的基礎。因此，對流動的關注使作者突破了民族國家的框架，而這種突破也使他注意到邊疆的重要性，正是由於位處邊疆，跨越民族國家的流動性才顯得更強^⑧。

第二，正是源於對邊疆和流動的深入考察，作者提出了自己對民族國家理論的看法，尤其是對安德

在作者看來，孟加拉灣東部於十九世紀下半葉構成了「生態的、文化的、法律的邊疆」。對流動的關注使作者突破了民族國家的框架，注意到邊疆的重要性，正是由於位處邊疆，跨越民族國家的流動性才顯得更強。

森 (Benedict Anderson) 「想像的共同體」理論進行了反思^⑨，並試圖通過跨區域研究方法對其進行補充。

作者以孟加拉灣為個案，比對安德森的「印度尼西亞模式」。他認為安德森的理論在孟加拉灣地區並不成立，因為這裏有很多不同族裔和語言的報紙，以新加坡為例，有泰米爾語、華文、英文、馬來文，等等，它們相互之間並不排斥。因此，想像的共同體應該是複數的 (頁 165)，它們在二十世紀初對東南亞的民族國家建構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由於這裏的移民社會特徵，歸屬感並不僅僅為民族國家所有，也為特定的族裔社群所有。然而，隨着一戰前後中國、印度民族國家思潮和運動風起雲湧，孟加拉灣周邊的移民與其母國之間的密切聯繫難以為繼，對國家的歸屬感確定在了特定的土地上，而非海外的離散社群中 (頁 169)。雖然離散社群的歸屬感被大大削弱，但母國的意象卻依然在海外的居民中間流行。可以看出，作者有關離散社群的論述對安德森的民族國家理論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

對於流動性的考察始終貫穿在《穿越孟加拉灣》一書當中。流動性往往體現在陸地上，這也體現在近年來斯科特 (James C. Scott) 的「贊米亞」(Zomia) 理論中^⑩。斯科特認為被稱作「贊米亞」的高山地帶是對以平原為中心的國家控制的逃離，而本書則展現了一幅孟加拉灣周邊海域上流動的畫面，對斯科特的理論有一定的補充意義。無論是高山還是海洋上的流動，都可以被看作是對國家控制的反思。當移民到達新的居住地以後，仍然面臨

着對國家的想像和認知，這將決定他們認同哪一個民族國家。而離散性是對特定地方、民族和區域空間之內的民族國家想像的衝擊，甚至可以將其顛覆^⑪。因此，在作者看來，國家會控制海洋和構建歷史話語，曾經的流動會消失在國家邊界封閉之後。但是，歷史上的流動仍然會給新建構的民族國家產生很深的印記，譬如今日緬甸西部長期未能解決的羅興亞人 (Rohingya) 問題就是一例。這正是國家邊界關閉和遏制了流動性的結果。

因此之故，我們對於區域研究必須有新的認識。作者一開始便說道，在二十世紀中期民族國家重新劃定邊界的浪潮中，孟加拉灣漸被遺忘，而在戰後興起的區域研究被分成了南亞研究和東南亞研究兩個陣營時，這個區域恰好處於各國的分界線，又無法被歸類 (頁 1)。作者強調過往的區域研究對孟加拉灣這一區域的割裂性，譬如關於馬來西亞和緬甸的研究僅僅被局限在東南亞研究圈子，與印度毫無聯繫，這種畫地為牢的做法受到美國區域研究影響所致 (頁 244-45)。有鑒於此，該書體現出創新性和突破性——作者的研究既是區域史，也是一種跨區域的歷史。也可以說，只有通過跨區域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充分地認識區域史。

第三，對民族國家框架的突破也是長期以來區域史研究發展的結果，這使得該書特別關注跨區域的生態和環境問題。

當前孟加拉灣這個區域周邊聚集着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卻面臨着極其敏感脆弱的生態環境，這都促使作者想要揭示出人類活動與生

在二十世紀中期民族國家重新劃定邊界的浪潮中，孟加拉灣漸被遺忘，而在戰後興起的地區研究被分成了南亞研究和東南亞研究兩個陣營時，這個區域恰好處於分界線，又無法被歸類。

《穿越孟加拉灣》一書勾勒了孟加拉灣歷史上的移民和反移民，也述說了其從跨國流動到民族國家封閉邊境的轉變，再到新的遷移問題出現的長時段變遷。與遷移同時進行的，是生態環境的變化及其對該地區的反作用。

態環境的關係。此前，印度洋史的研究者喬杜里 (K. N. Chaudhuri) 等人受法國年鉴學派的影響，特別關注經濟活動和長時段方面的地理、環境變遷^⑩。近年來，環境與民族國家的關係也受到關注^⑪。作者認為孟加拉灣並非靜止、被動的，而是時刻在變化之中，早期有影響這裏的季風、水位、洋流、植被，到二十世紀，人類對這裏的干擾愈來愈多，重塑海洋，出現了海岸線的變化、森林植被的改變、錫礦的開發，等等，在在打破了孟加拉灣自成一體的系統。到二十世紀後半葉，人類活動對這裏的改造速度更快，由於移民活動、國家開發、技術進步，孟加拉灣經受着「聯合或撕裂」，這個區域已經與人類歷史密不可分，移民與環境的關係更是如此 (頁30)，這也是作者的關懷所在。因此，他關注和描述的海洋是動態的，是與人類活動、自然變遷息息相關的。

第四，該書從邊緣和底層的角度重述歷史，注重底層民眾，同情作為弱者的移民勞工。

雖然傳統的經濟社會史也強調日常生活，但是對底層和邊緣的重視還是來自於二十世紀後期後現代主義的衝擊，尤其是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瘋癲與文明》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對於邊緣人群的重視^⑫，帶動了對邊緣群體的重新認識。印度流行的後殖民主義對庶民的關注也是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把關注點轉向了普羅大眾。作者也在書中引用了查克拉巴提 (Dipesh Chakrabarty)、查特吉 (Partha Chatterjee)

等學者的庶民研究來討論孟加拉灣的底層移民的問題。此外，作者大量使用人類學研究方法，親自走訪了孟加拉灣周邊大部分地區，尤其是在印度、馬來西亞、緬甸、印度尼西亞進行田野調查，並且與很多當地勞工深入互動，了解他們的移民經歷 (頁343)，也了解到這些勞工會運用法律武器為其自由而戰，如訴諸工會、法院，甚至利用網絡傳播其遭遇 (頁270)。這種對底層民眾的同情，也使本書充滿着濃重的人類學色彩。

三 小結

在當前這個全球化浪潮與民族主義情緒並起、工業時代遺產與生態文明衝突的時代，《穿越孟加拉灣》一書勾勒了孟加拉灣歷史上的移民和反移民，也述說了其從跨國流動到民族國家封閉邊境的轉變，再到新的遷移問題出現的長時段變遷。與遷移同時進行的，是生態環境的變化及其對該地區的反作用。這不由得令人聯想到當前地中海和歐洲這個正被移民問題困擾的區域，以及其他正在被全球化和本地化所撕裂的地區。可以說，《穿越孟加拉灣》一書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經驗和教訓。

註釋

⑩ 阿姆利特的其他著作，參見 Sunil S. Amrith, *Decolonizing International Health: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1930-65*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Migration and Diaspora in Modern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等。他是《現代亞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等著名學術期刊的編委會成員，也負責為哈佛大學出版社主編「亞洲的連結」(*Asian Connections*)系列叢書，同時還參與編寫《新編劍橋印度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第二卷(預計2019年面世)。

② 朱明：〈建構和爭論中的印度洋歷史——書寫亞洲海洋史的嘗試〉，《全球史評論》，2015年第7期，頁85-99。

③ 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0); Michael Pearson,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Routledge, 2003)，中譯本參見朱明譯：《印度洋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未刊)。

④ 參見 Merry E. Wiesner-Hanks,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7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即將由上海三聯書店推出中文譯本。另外參見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著，強朝暉、劉風譯：《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⑤ Frederick J.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94), www.historians.org/about-aha-and-membership/aha-history-and-archives/archives/the-significance-of-the-frontier-in-american-history.

⑥ Willem van Schendel, *The Bengal Borderland: Beyond*

State and Nation in South Asia (London: Anthem Press, 2005).

⑦ 如前文提到的朱羅帝國、室利佛逝帝國，以及中世紀晚期分別出現的毗奢耶那伽羅(Vijayanagar)王朝和滿者伯夷(Madjapahit)王國，還有二者之間的錫蘭、馬六甲等小國。

⑧ 當前關於印度洋地區的研究特別注重連結，參見 Engseng Ho, *The Graves of Tarim: Genealogy and Mobil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Eric Tagliacozzo, Helen F. Siu, and Peter C. Perdue, eds., *Asia Inside Out: Connected Pla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⑨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⑩ 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王曉毅譯：《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6)。

⑪ 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著，劉冉譯：《消散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維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頁44。

⑫ K. N. Chaudhuri, *Asia before Europe: 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⑬ 參見 K. Sivaramakrishnan and Gunnel Cederlöf, eds., *Ecological Nationalism: Nature, Livelihoods, and Identities in South Asia*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⑭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7)。